

【论 文】

1940 年的盛世才与他治理下的新疆

——读《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¹

马 戎

摘要：民国时期曾经统治新疆长达十二年的军阀盛世才，在 1940 年曾在新疆制造了一个“国际阴谋暴动案”，涉及新疆各族官员数百人和苏联驻新疆多名外交官。在该案审讯过程中，盛世才多次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电报和外交邮件，汇报讨论案情。其中部分原始档案文件由当年在新疆军队服役的张大军先生于 1949 年带到台湾，1997 年在台中市出版，书名为《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本文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介绍了这一“暴动案”档案文件的主要内容，分析了盛世才本人的政治理念及他与斯大林的交往，这些讨论有助于今天的读者认识 1940 年代的盛世才和他治理下的新疆。

关键词：盛世才 1940 年新疆国际阴谋暴动案 斯大林

2013 年春季，应台湾中兴大学王明珂教授的邀请，我在位于台中市中兴大学访问三个月。在此期间，通过台湾政治大学的张中复教授得知《新疆风暴七十年》的作者张大军先生就住在台中，立刻就想到要去拜访他。1980 年由台北兰溪出版社出版的《新疆风暴七十年》共 12 卷长达 7429 页，我在十多年前就读过，是一部详细记述民国时期新疆政治社会状况的极具史料价值的巨著，如果能有机会见到这位当年新疆政治风云的亲历者，在我自然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

从网络上查阅《新疆风暴七十年》的评论，我看到有关张大军先生的一段简介：

张大军，原系国民党叶成部上校参谋，在新疆 923 和平起义后，用了十几头骆驼将上万卷新疆历史档案载运走，随叶成经南疆，途中历尽艰苦，转道印度到台湾，几乎扔掉了全部随身物件，但没有丢弃一份档案材料。回到台湾后，张大军潜心研究新疆历史，于 1980 年出版了 500 余万字的《新疆风暴七十年》，记载了由 1909 年至成书之时，新疆之历史进程。作者利用了从新疆带走的省政府的档案资料，以及大量的报刊、回忆录和他本人的采访及调

¹ 本文刊发于《青海民族研究》2015 年第 1 期。

查资料，该书资料丰富，其中对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也有较全面的研究，如领土、勘界、商贸和英侨等。此书是研究新疆现代史的权威之作¹。

这些宝贵的历史档案文件，在战火中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据张大军在《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的“主编者序”中提到“尚有许多俄文致莫斯科文件，不幸在经过喀喇昆仑山时，马匹坠入山涧遗失，仅存此约四十余年的密档”，可见当年的旅途是何等之艰难，这些留下的史料是何等之珍贵。

2013年3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在张大军先生寓所见到这位102岁的老人，可能是出身行伍的原因，他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对40年代的许多往事记忆得非常清楚，也许是平时很少有人与他谈及民国时期的新疆，老人很兴奋也很健谈。这位百岁老人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向老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临别时，老先生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外，一直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离去，远远地看着老人在门旁伫立的身影，想到国共内战和两岸沧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2013年3月摄于台中张大军先生寓所

在交谈中，老人送给我们一本1997年由他主编出版的另外一本书，这就是本文主题中的《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中亚出版社），并题字留念。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上课和其他杂事，直到2014年暑假才抽出时间来阅读这本书，发现这份史料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首先是历史真实性，它是完全根据新疆密档中的原稿刊印的；第二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案情陈述和原始笔录，字里行间透露出当年新疆党政机关内部的运行规则，特别是生动地展示了苏联顾问和苏籍人员在新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位置与作用；第三，盛世才本人向斯大林的长篇“陈情自白”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统治新疆十二年的铁腕人物和他的政治观念。也许这些写给斯大林看的文字并不完全是他的真心话，但是至少表明他把这套“斯大林式”的政治概念和思维逻辑已运用得极为纯熟。

在民国政府地方军政首领当中，盛世才确实与众不同。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曾先后三次会见盛世才。盛世才所受到的接待，是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政要未曾得到的。正是在此次莫斯科之行中，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被秘密吸收加入苏共²。

¹ <http://bbs.my0511.com/f152b-t4656497z-1-6>

² 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1938年9月2日盛世才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会谈记录，斯大林同意盛世才秘密加入联共，但担心此事泄漏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给盛世才今后的工作带来不便。
<http://baike.so.com/doc/1454444.html>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本书中介绍的部分内容讨论几个问题，看看这些原始档案材料能否帮助我们认识盛世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民国时期在他治理下的新疆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据张大军先生在“序”中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是 1940 年 6-7 月新疆督办盛世才给苏联领袖斯大林呈报的几份秘密报告全文及附件，主题是对当时在新疆审讯的“国际阴谋暴动案”的审讯过程、犯人口供以及盛世才本人对案情的陈述。这一案件当时成为轰动国际的新闻，涉及新疆省副主席、多位厅局级省政府和地方高官，甚至在审讯过程中还牵扯到苏联驻新疆的高级外交官和苏联内务部官员。涉案的国内官员大多被处死或“意外死亡”。斯大林听信了盛世才的这份报告，因此那些被涉及到的苏联官员都被“极刑处理”。“序”中对此是这样介绍的：

(盛世才)十多年中，翻云覆雨，杀人如艺，不仅牵涉到各民族领袖，且关系到军政要员，尤其民国二十九年(1940)在新疆的“带国际性的大阴谋暴动案”更为离奇，破获了维族领袖和加·尼牙孜(新疆省副主席)、汉族暴动领袖杜重远(时任新疆学院院长)和阿山行政长沙里福汗，及文化人沈雁冰(茅盾)、张忠实等人；更有关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欧杰阳克、阿山领事苏里唐诺夫，以及英国领事等。盛世才为此一国际大暴动案，牵涉联共、中共与苏联领事、军事顾问等关系复杂，特请莫斯科派员协助审讯，于是斯大林特派葛内斤、卡克雷金等来新(疆)协助。孰料这些苏联专家来新(疆)审问犯人时，全部翻供，谓系盛氏审讯人员以酷刑迫出来的，向盛提出了声明书。盛闻之大怒，旋向莫斯科提出声复书，另请聂色克来参加审讯。不料聂色克也认为是酷刑拷打逼出来的口供。盛便向莫斯科提出检举，控告他们是同情托派组织参加阴谋工作。斯大林看到数十万言的报告书，其内政部派来的干员居然在新疆违反‘马列斯’主义，人员成为托洛茨基匪徒，真是火冒三丈。这齣好戏在斯大林面前扮演了很久，苏联派来的人，均被调回以极刑处理。同时盛氏也清除了在新疆的联共党徒，也警告中共在新疆要安分守己。……

此稿系由盛世才督办公署秘密档案中发现，……以蓝色打字大型原稿，共 487 张，内中经过盛世才以蓝色亲笔改正处极多(张大军，1997：5-6)。

从张大军先生编辑的《报告书》和《新疆风暴七十年》两本书中可以了解到，盛世才在 1940 年 6 月 18 日给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同日发出两封电报。6 月 19 日去电一封，指控苏联驻迪化代

总领事欧杰阳克等人“是帮助英帝国主义领导新疆阴谋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担心通过苏联领馆转送的邮件可能出现误差，盛还另发送一整套材料给自己在莫斯科学习的弟弟盛世骥，并在电报中特别要求“关于欧杰阳克、叶尔洛夫、阿不都热合满及齐合云斯克（均为苏联领馆官员）等的重要材料，均存在于留莫斯科陆军大学生盛世骥¹手中，请伏罗希洛夫元帅或莫洛托夫委员长迅速召见盛世骥，即能由盛世骥将材料交给你们”。从这种安排，也可以看出盛世才做事之细致缜密。

6月20日盛世才再给斯大林等人发去长电一封。6月24日又发出一份电报，直接控告6月初苏联派来参与审讯的内务部人员葛内斤、恰克雷斤两人诱使犯人翻供。6月27日再发特急电报“请你们火速加派最忠实列宁斯大林党的三五人来新疆帮助审讯工作，在这三五人内最好希望你们最亲信的、最忠实于你们二三人参加到里面为盼”（张大军，1997：12）。

7月5日盛世才又发出一份电报，控告苏联第二次派来参与审讯的内务部人员聂色克与葛内斤、恰克雷斤同样诱使犯人翻供，并“诬蔑”盛安排的审案人员李溥霖、李英奇，盛世才在这封电报中逐条反驳聂色克的《声明书》。7月18日，盛通过苏联总领事外交邮差转送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关于“国际阴谋暴动案”全部口供和盛本人的说明材料，之后又发电报对7月18日的邮件加以说明，表示该邮件分别送斯大林等三人“亲自拆阅”，外皮用火漆封住，火漆上有“盛世才”三字的水晶名章，“同时在本材料里边的每页上均书有盛世才三字的名章，务必希望你们抽暇详细阅看为盼”（张大军，1997：65）。盛世才直接发送到莫斯科的电报的台头是：“尊敬的斯大林先生、莫洛托夫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大元帅”，结尾是“谨此恭请你们的身体健康，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²在这两个月内，盛世才发往莫斯科的电报和邮件频率之密集，篇幅之巨大，实属罕见。

此案在新疆共拘捕五百余人，涉及汉、维、哈、回、柯、蒙、塔等各族高级官员和军官，此案的审理对新疆政局和民族关系影响深远。据盛的回忆录称，此案在新疆仅处死59人，但是后来的调查证实，杜重远、库尔班·尼亚孜等实际上均在狱中被毒死（张大军，1980：4312-4313），大批人犯长期关押。直至1944年9月盛世才离开新疆、吴忠信主政新疆后，包尔汉等涉案人员于11月得以释放出狱。而盛世才控告的苏联人员，均被调回处死³。

张大军先生主编出版的《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中收集了6月27日、7月18日的邮件及之后的电报内容。全书分十三编70章共581页，由于主要内容是省政府、不同地区涉案人员的供词和参审人员的记录，涉及许多人员与事件的细节，读起来难免有些枯燥。但是盛世才对这些供词的归纳和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对于研究民国历史的人而言，还是值得一读的。

二、盛世才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自我表白

首先介绍一下盛世才这份报告书的时代背景。1939年9月和10月，苏联和德国瓜分了波兰，苏联随后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1940年德军占领了荷兰、比利时，逼迫法国投降并空袭英国，1941年春季德军在攻占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后，于6月22日跨越苏联边境，发动全面侵苏战争。

¹ 盛世骥是盛世才的三弟，长期留学苏联并主张亲苏，返回新疆后担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1942年，盛世才转变政治态度，开始反苏反共，在他进行政治大清洗之前首先暗杀了亲弟弟盛世骥。

² 据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回忆，1940年春季他曾被关押在第四监狱，公安处要求他将一些材料译成俄文，“其中有盛世才写给斯大林的信，信里诬称派来的干部都是托派，请斯大林另派一些可靠的人来”（包尔汉，1984：271）。

³ 《民国新疆史》认为“后来斯大林并未理会此事，只是将陈培生（边务处长）调回，又分到中国其他地方工作”（陈慧生、陈超，2007：360）。在1937年盛世才策划的另一起“阴谋暴动案”中，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等被盛诬为“托派”后，送回苏联并执行枪决，那次清洗中，新疆区内被捕约2000人，解至迪化约800余人，“盛世才承认有33人被判处死刑”（陈慧生，陈超，2007：356）。

盛世才的《上斯大林报告书》签署的日期是1940年6月27日，恰恰在苏联向西推进的一年之后和德军进攻苏联的一年之前。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和敏感的历史时刻。

在国内抗日战场上，1940年5月日军发动枣（阳）宜（昌）战役，6月12日攻占宜昌，张自忠将军殉国，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抗战形势极为严峻。在苏联国内，1934-1938年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党政军各部门开展了“大清洗”，把托洛茨基驱除出国，处死了大批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高层领导人，全面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1939年苏联与日本和希特勒德国分别签订了《停战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处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省在财政、军械、物资各方面不但不能从内地得到支持，而且成为从苏联向中国抗日前线运送物资的重要战略通道，所以民国政府对于盛世才在新疆实施“亲苏”政策，也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态度。

1. 该案发生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

在对“国际性各族联合大阴谋暴动案”的总结中，盛世才这样分析该案的政治背景：

这些新疆托匪、中国托匪及英日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对新疆一再进行破坏阴谋，丝毫不肯退步的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1）新疆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后方，是苏联援助中国的唯一运输要道，割断这条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要道，必须破坏新疆。（2）新疆的政权是反帝亲苏的政权，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和平阵线之重要外围据点。新疆现政府之存在节约了苏联警卫边界红军的巨大兵力，因此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及托匪企图进行反苏阴谋，在英属印度的边上树立起反苏根据地，则必须首先破坏与苏联几千里接壤的新疆。（3）因为新疆在六大政策，尤其是反帝亲苏两大政策领导之下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情况间接影响了和刺激了印度革命浪潮之高涨，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印度之统治权，必须要首先破坏这个激动印度革命浪潮的新疆。（4）新疆有广大的土地，有丰富的宝藏，英日两帝国主义和托洛茨基匪徒，企图利用新疆民族复杂、文化落后、兵力薄弱这些条件，将新疆变为英日两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和反苏政权的根据地，以便他们取得现代战争机械兵团所需要的大量油田，而维持其强盗战争，必须要破坏新疆（张大军，1997：365-366）。

这段背景介绍完全以苏联的战略考量为中心，表明盛世才治理的新疆“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和平阵线之重要外围据点”，唯有支持他统治下的新疆，才能防止“新疆变为英日两帝国主义的附属品和反苏政权的根据地”。盛世才完全摸透了1940年斯大林的战略考虑，完全迎合了斯大林对周边区域的战略部署，自然很容易取得斯大林的信任。

2. 涉案苏联人员的“社会主义”是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

但是在该案的供词中，盛世才检举的苏联驻新疆外交官对当地人员进行“阴谋煽动”所使用的言语都是“社会主义”话语，他们鼓励新疆参与该案人员发动暴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

义的维吾尔斯坦”，这应该是完全符合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理念的。所以，如果盛世才想控告他们，只能说这些苏联外交官的“社会主义话语”是伪装的面具，并把他们与斯大林最为痛恨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表明这些苏联官员推动的所谓“亲苏”，实际上亲的是“托派的苏联”，而不是斯大林的苏联。

但是托匪及英日帝国主义者亦曾亲眼看到：苏联的国力日益强大，和平外交政策日益胜利，中国抗战虽然现处在艰苦的阶段上，但其趋势已向着胜利前途迈进着，而使日寇泥足愈陷愈深。新疆方面政府六大政策，尤其是反帝亲苏两大政策，已教育着影响着全疆各族民众，而引导着各族民众趋向着反帝亲苏联的坦途前进，尤其是各族青年及反帝军已对反帝亲苏政策有了相当的信仰。这些事实告诉了他们：“公开在新疆树立反苏政权是完全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他们要想在新疆进行反苏阴谋势必要拿出一套“似是而非”的“亲苏”主张，用来掩护他们反苏的丑恶面孔，用此蒙混一般人的注意，而便于他们进行活动。这次维族阴谋暴动组织标榜出成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的主张，正就是以“亲苏”做掩护而暗中进行反苏阴谋的表演（张大军，1997：367）。

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军内的地位和威望使他成为斯大林争取苏联最高领导地位的主要障碍。列宁在遗嘱中曾高度评价托洛茨基，同时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因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极深。在苏共内部斗争中，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开除出党，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除出国，1938年成立“第四国际”，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暗杀¹。在德军进攻苏联之前，斯大林开展的主要政治运动就是彻底清除党内的“托派分子”。盛世才把这些苏联官员称为“托匪”，恰好触动了斯大林的痛处，而且这些驻新疆外交官大多来自苏联各中亚共和国，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期间很可能与他们有过接触，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托派”嫌疑。而“托派”的主要罪名（或者说主要策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反对斯大林。盛世才对这些苏联官员使用的分析逻辑与斯大林在党内“大清洗”的逻辑一拍即合。

盛世才指控苏联领事馆官员是“托派”时，还提供了中国“托派”的供词，争取将其做成“铁案”：

据杜重远亲笔供称：……我问重庆托派组织何以有把握介绍沃代总领事（即欧杰阳克），张（仲实）说沃代总领事原系苏联托派，我们共同的目标是破坏新疆现政府，妨碍中国抗战工作，最后好进攻苏联（张大军，1997：313）。

为了使杜重远的以上供词具有可信度，盛世才提供了该案审讯的他人的详尽供词（库尔班

¹ <http://baike.so.com/doc/6272310.html?from=125762&sid=6485734&redirect=search>

色·以多夫、沙里福汗、史枚)来证明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成为一名托派分子的始末以及杜重远在新疆开展“托派活动”和秘密会议上布置反苏阴谋暴动的大量旁证(张大军,1997:190-197,213-251,264-278)。

3. 为什么新疆不能马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在新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错吗?让新疆的无产阶级、贫苦农牧民获得解放、掌握政权有什么错吗?这难道不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正当目标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盛世才还必须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对这一点加以说明。

首先,盛世才无法从原则上否认新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

原来新疆是具备着由旧世界跳跃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条件,这个条件首先表现在新疆与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理上有数千公里的土地毗连,以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予新疆以最大的优良影响,尤其是在此影响之下,新疆已建立起来了崭新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政权¹。一方面用六大政策的形式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各族先进青年教育着马列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充实着他们的意识和思想(现在新疆的文学校学生及军官学校学生均在课外研究列宁主义问题及斯大林传,并在正课内的讲堂上由讲师讲授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一方面新疆与苏联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这不仅是说明我个人用六大政策领导着整个新疆经过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向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奔驰着,同时在客观上也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使新疆比中国其他各省先跳跃到社会主义新世界里边去(张大军,1997:368)。

他在承认存在这种客观可能性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努力表白自己在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斯大林(要求学生学习《斯大林传》)、推动新疆朝着“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目标迈进方面所做出的成绩,这无疑拉近了他与斯大林的感情与心理距离。但是话锋一转,他开始论证“在目前”新疆尚不适于“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由:

在六大政策,尤其是反帝亲苏政策领导下的新疆,虽然具备着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与条件,但是在目前决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把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这一主张实行起来,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在新疆要实行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其所以错误的地方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目前新疆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而没‘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时

¹ 六大政策中的“民平”指民族平等。

机’。因为新疆是中国的一省，是整个世界的一部份。……要在新疆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有以下几个机会：

(1) 印度革命浪潮高涨使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发生动摇并走向崩溃的时候。(2) 中国革命浪潮高涨，国内反动势力锐减或瓦解的时候。(3) 中国革命退潮，国内反动势力特别抬头的时候，如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政党——国民党受亲日派之包围与压迫走到对日投降、进行内战进攻共产党，而使中华民族革命遭受危险的时候。……

因为在新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给印度民族革命以最大的鼓动，而予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以有力的威胁。如果这个情形不是在印度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势之下发生，那么英帝国主义定要拼全力扑灭这堆对自己特别不利的革命火焰，甚至对新疆进行武装干涉，这就等于挑拨英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反苏阴谋。

其次在新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在中国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势之下发生，那么必然要遭到中国国内反动势力之对抗，必然使中苏两国友善关系陷于破裂，而在中国抗战后方掀起国内反动势力与新疆之内鬩，破坏了中华民族抗战之前途。

但是如果遇到了中国革命退潮的时候，国内占最大势力的国民党已经对日投降，而对革命势力进行剿灭，中国有亡国危险的时候，新疆为了保存自身的革命实力，为了声援进步的势力，为了打击反动势力，为了彻底争取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胜利，为了反对国内一切反动投降势力，必须毅然决然站在最坚决的革命立场上，摆脱一切反动势力之束缚，在新疆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时对于英帝国主义及国内任何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均可有所不顾。相反地，如果中国革命并没有退潮的时候，而在新疆实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就等于分裂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就等于破坏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这就等于在客观上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大军，1997：368-370）。

斯大林知道英国丘吉尔首相是坚决反共的，英国和法国在早期之所以对希特勒德国采取“绥

靖”政策，就是希望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的苏联。所以斯大林对英国的政治动向一直非常警惕。盛世才提出英国通过印度干预新疆并扩大英国在新疆影响力的可能性，斯大林对此具有同样的担心。从1940年的欧洲和亚洲形势来看，斯大林所最希望见到的局面就是保持新疆的现状。除非中国政府被像汪精卫这样的亲日派完全掌控，新疆有被日本势力控制的危险时，斯大林才会考虑推动改变新疆的现状。

盛世才认为不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的第二个理由是：

第二，新疆只能建立十四个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能建立单独一个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新疆共有十四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有数百年共生共荣的历史。在将来新疆得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时机，也必须要建立十四个民族的“新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绝不能仅仅是单独一个维吾尔民族的“维吾尔斯坦”。维族阴谋组织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完全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之反动意识的表现，这里丝毫看不出一点国际性的社会主义的气味来（张大军，1997：370-371）。

从这段话来看，盛世才对新疆民族关系复杂性的认识还是有所了解的。在他真正掌握新疆军政大权的道路上，他曾经面对的竞争者包括了回族的马仲英、马虎山，汉族的张培元以及维吾尔、哈萨克族的地方首领，即使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占大多数（当时一个说法是占80%），他也认为不宜在具有十四个民族“数百年共生共荣历史”的新疆把其中一个民族单独突出出来。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到了“狭隘民族主义之反动意识”。

4. 盛世才对斯大林的效忠表态

令斯大林读后心里最感舒服的一段话，应当是盛世才表达出来的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的绝对敬仰和坚决服从：

除去具备以上三个时机中的一个时机之外，还必须要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斯大林先生的允许才能够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任务在新疆“实行”起来（张大军，1997：369）。

同时，对于刚刚在强力下被合并进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盛世才表示了自己的羡慕之情，这不仅对斯大林吞并三国表示了肯定，而且暗示自己希望新疆有朝一日也能够如波罗的海三国那样“跳跃到新世界”。

我亦曾羡慕西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家已经得到了解放，已由旧的世界跳跃到新世界里边去了。虽然他们与新疆一样同苏联在地理上接壤，并受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良影响；但是他们的国内形势与中国的国内形势却有诸多不同之处。现阶段国际形势给予他们的影响和给予新疆的影响，也存在着许多异点。爱、拉、立在今天跳跃到新的社

会主义世界里去，是由于抓住了有利的时机。同时他们这一跳跃对于自己、对于世界革命都是有利的。但是目前在新疆因为没有那样有利的机会，如果要像维族阴谋组织所主张的一样，在新疆建立“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斯坦”，对于中国，对于苏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有害的（张大军，1997：370）。

最后话锋一转，盛世才把他检举的几位苏联外交官“定性”为“托洛茨基匪徒”并“阴谋反苏”。这些人居然在领袖斯大林没有直接下达命令的条件下，“擅自”在新疆推动“建立社会主义维吾尔斯坦”这样的重大活动，破坏斯大林的国际战略，“与英帝国主义对于新疆的挑拨目的步骤相一致”。熟悉斯大林人格特点的盛世才所强调的这几点，恰恰都是斯大林最忌讳的。

总之，一方面新疆虽然是具备着由旧世界跳跃进入新世界里边去的条件，可是在时机未到和未能够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斯大林先生的允许的时候，而欧杰阳克（迪化苏代总领事）、阿不都热合满（苏领馆人员）、耶果洛夫（苏领馆人员）等在暗中阴谋进行着所谓组织‘社会主义维吾尔斯坦’的勾当，不只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命令，而且是充分证明了正是托洛茨基匪徒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欧杰阳克、阿不都热合满、耶果洛夫等指挥与策动下的维族阴谋组织在新疆组织‘社会主义维吾尔斯坦’的事件，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好像似使新疆与苏联更加亲密起来，与实行马列主义。可是在骨子里便正是进行着违反马列主义与阴谋树立反苏的根据地。同时还充分暴露出他们对于中苏两大国的友善关系、对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各个势力的相互关系，对于新疆十四个民族亲密团结关系的离间与挑拨，他们这种挑拨与离间，按照下列的几项事实看来，也正与英帝国主义对于新疆的挑拨目的步骤相一致（张大军，1997：371）。

盛世才在莫斯科曾经三次会见斯大林，在这封报告书中，他自然也不会忘记强调一下自己与斯大林的特殊私人关系。

我有为马、列、斯主义前途胜利做斗争的七年长时间的历史原因，苏联与新疆的亲善一天比一天亲密的原因，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先生和他最忠实的战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先生对我个人的思想深刻了解、对我信任的关系，我才敢于检举他们（指苏联官员）（张大军，1997：383）。

这些用词难免不使我们回想起斯大林在世时苏联政坛上的“个人崇拜”话语和中国“文化大

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话语。“斯大林主义”一词最早由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提出，尽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的斯大林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汇，但是盛世才在《报告书》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且把斯大林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本人至少对此是不会反感的。

最后盛世才声明，他将对报告书中提交的事实及口供材料负全部责任：“不论到何时我是完全负责的，倘要有冤枉了耶果洛夫、欧杰阳克、阿不都热合满等的地方，我甘愿以马、列、斯主义信徒的资格，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先生的面前领受任何严重的处罚！”（张大军，1997：384）。这完全像是帮会里一个表示忠心的下属对帮会领袖的赌咒发誓，哪里像是中国一个省的军政首脑与外国元首的国际交往。

三、盛世才对“国际阴谋暴动案”案情的具体陈述

1. 反驳苏联内务部来新疆参加审讯官员对盛世才亲信提出的指控

斯大林第二次派来对新疆“国际阴谋暴动案”进行审讯的苏联内务部官员聂色克对涉案人犯进行审讯后，明确提出盛世才安排对该案负责审讯的两名官员（审判委员会委员长李溥霖、公安处长李英奇）有严重逼供行为，所获得的证词不足信。盛世才对此进行申辩的方法是坚称此二人的政治正确性和人品可靠性，而证明这一点的依据是盛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干部政策。

该项所称各节并无事实的根据，因为李溥霖、李英奇不只是无破坏新疆与苏联之间友谊关系的事实，而且在他们的工作上、行动上、言论上以及喜欢研究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及趋向信仰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各方面的事实，足以充分证明了是六大政策尤其是亲苏政策的正确执行者。**我在斯大林先生及其最亲近的战友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的经常领导之下，在七年的长时间与英日两帝国主义及托洛茨基匪徒的苦斗奋战的宝贵经验中，我也学会了选拔忠实干部，我也学会了认识谁是忠实六大政策的忠实干部，如果李溥霖、李英奇是不忠实的分子，在我自己经常地特别提高了警觉性的考察人的条件之下，我决不能以审判英日两帝国主义走狗及托洛茨基匪徒并谋刺我的刺客的重大责任交付与他们二人办理**（张大军，1997：45）。

我对第三十四项的声付：**该项所称各节虽然一部分有相当理由，可是聂色克不了解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盛督办和在六大政策领导下公安管理处处长李英奇，是完全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幸福的，不敢冤屈逮捕一个任何民族的人**（张大军，1997：46）。

盛世才的分析逻辑是：（1）自己处于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经常领导下”，政

治上必然是正确的，而且“学会了”如何识别干部；（2）李溥霖、李英奇是盛世才亲自选定来负责审判这一重大案件的，所以必定是可靠的；（3）如果怀疑李溥霖、李英奇的可靠性，实际上就是不信任盛世才；（4）连斯大林主义忠实信徒盛世才也不相信的人，只能是斯大林的敌人——托洛茨基匪徒。

新疆在当时苏联的国际战略当中非常重要，斯大林需要一个稳定和亲苏的新疆。而盛世才至少在表面上对斯大林极力表示忠诚，在新疆全面执行亲苏政策，苏联军队驻扎在哈密等地，苏联顾问在新疆各地指导当地政府的工作，苏联可以随意在新疆开采矿藏，这些利益和战略影响力是斯大林决不愿意失去的。盛世才把话讲到了这个地步，斯大林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无论他是否真心相信这些苏联官员确是“托派”，他也必须把他们当作牺牲品来换取盛世才的继续效忠。

2. 对人犯审讯中提出的对自己不利的供词予以反驳

在对案犯口供进行驳辩时，盛世才对于涉及自身的那些指控，也一再强调自己对苏联和抗战的全力支持，在涉及的具体事务中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例如：

据阿不都海米提·买合苏多夫供称：库尔班·色以多夫（财政厅副厅长）说：“（盛世才）

督办对于中央并不好好帮忙，自从抗战以来以援助抗战的名义向民众收集的捐款为数不少，寄往内地的也不过是十架飞机，依我看所募集的款不止十架飞机，应当还要多”。

的确我从来没有帮助过，并且也不能帮助国民党的中央，但是我对于中国的抗战是以最高的热诚帮助着，我曾开放了直接援助抗战的中运，我曾发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捐款，我曾尽全力地保护了中国西北的国际交通路线……这些事实，不是说明援助抗战吗？至于在民众中收集抗日捐款，是由新疆的民众联合会主办的，负责的人是反帝会秘书长王宝乾（现在的外交署长），政府并未派人参与其事，也没有染指的可能。同时政府也相信王宝乾在这工作中绝无贪污的情弊。那么库尔班·色以多夫这不是有心造谣吗？（张大军，1997：168）。

3. 强调新疆与中亚的特殊关联和相互影响

盛世才在报告书中多次提醒斯大林，新疆各突厥民族的血缘、语言、宗教、部落社会传统与苏联中亚各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强大作用下，新疆的形势有可能会影响苏联在中亚突厥民族地区的统治。

驻阿山苏联领事馆的秘书那扎洛夫……说：“中亚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是一样的，互相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哈族、乌兹别克、塔塔儿、塔吉克、土尔克尔等民族虽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单独的民族，因为按历史来看，他们都是土耳其血统。在苏联虽说是没有民族观念，但实际上民族还是存在着。无论哪个人还是爱着自己的民族，把一个民族同化成

另一个民族，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将来中亚各民族团结起来，能成立一个很大的国家，那

时用不着分东西土耳其斯坦了”（张大军，1997：178）。

苏联虽然进行了“民族识别”并为各“民族”设立了不同层级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但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对“阶级意识”的强调是远高于“民族意识”的。苏联中央政府一直极为警惕各少数民族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中亚的形势尤为特殊，在1917-1920年期间，中亚地区一直存在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中亚的“大突厥国家”的呼声。“要彻底打倒泛突厥主义，就要铲除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庞大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怪影，首要的工作是对中亚的‘突厥民族’进行‘识别’，从而肢解现有的突厥斯坦共和国。……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五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王智娟，1999：20-21）。所以，斯大林对中亚各国的局势一直是非常谨慎地加以关注和掌控的。

在1933-1937年期间，苏联全部10个加盟共和国即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五国（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党政领导人都被清洗¹，同时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达格斯坦、车臣-印古什、楚瓦什等自治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也同时遭到清洗（赵常庆等，2007：125-126）。即使在这样的“大清洗”之后，斯大林也未必对中亚各国的苏共干部能够完全放心。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担心甚至也体现在斯大林对1944年在北疆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态度转变上，担心新疆如果真的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薛衔天，2008：348）。正是这一担心促使斯大林强迫势如破竹进军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领袖停止军事行动，命令他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并建立新疆“联合政府”。

1940年盛世才在报告书中描画的这个包括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在内的“大突厥斯坦”国家蓝图，“中亚各民族团结起来，能成立一个很大的国家，那时用不着分东西土耳其斯坦”，居然出自苏联驻阿山领事馆官员之口，这必然会引发斯大林对这些苏联外交官的不信任甚至愤怒。盛世才已经摸准了斯大林的这根脉。

4. 给该案主要嫌犯戴上“日本间谍”的帽子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斯大林一直面对着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希特勒德国这两个敌对国家。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后，得到了库页岛南部、南千岛群岛和东北的中东铁路，压缩了俄国在亚洲的发展空间。日本占领东北后，右翼势力一直鼓动关东军进攻苏联，只是日军在1939年“诺门坎”战役惨败以后，边境上才暂时安静起来。德军进攻苏联后，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同时进攻苏联，因此把大批军队集结在西伯利亚备战。只有在从中国方面获知日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东南亚）之后，斯大林才松了一口气，把集结在西伯利亚的部分苏军调往吃紧的西部前线。所以，盛世才很清楚，只要一提到“日本间谍”绝对会触动斯大林的敏感神经。

据沙里福汗（阿山行政长）供称：“……在这次会议上，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公开

发表说，他是汪精卫派来的，推翻新疆新政府，把新疆分成南北两路自治区域，北路由我（沙

¹ 在1930年代苏联内部有俄罗斯联邦和10个加盟共和国，在二战时期吸收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萨维亚，苏联解体时分裂为15个政治实体。

里福汗)领导,南疆由阿不都拉大毛拉(建设厅长)领导,在新疆组织一个新政府,由杜重远领导,外交、政治、军事、经济全靠日本。关于此话,大家都同意,没有发表其他的意见,杜并说对内政策是切断中苏的交通”(张大军,1997:195)。

根据沙里福汗亲笔供的一切事实材料说明:……杜重远则直接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汪精卫的指示。其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方面依靠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断绝中苏交通,破坏中国抗战后方的工作(张大军,1997:207)。

5. 在阴谋策动者的名单上除日本外,再加上英国

据沙里福汗供称:“……在宰牲节后第四天,阿不都拉大毛拉(建设厅长)在他的内宅对我说,喀什的阴谋组织中有个艾里阿訇在本年(1940年)的1月间来省,然后他又给我们通了消息,关于金钱的帮助,曾由英国方面供给着在省城的阴谋组织,英国也经由喀什阴谋组织给汇钱来。……我对阿不都拉说,你们向杜重远说,通知日本来三四十架飞机,把迪化军事机关轰炸不好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援助?他说他能办得到,没有办不到的”(张大军,1997:198-199)。

……同时还充分地证明了前阿山苏联领事苏尔唐诺夫与前代苏联代总领事欧杰阳克,他们是互相联系起来作为英日帝国主义的帮凶者,和直接唆使各族阴谋组织,尤其是主使维哈两族谋叛首领进行反对新疆政府的工作。又同时更确切证明了此次各族阴谋组织,是在英日帝国主义唆使和援助之下,及托匪们的积极策动之下,成立和活动起来的。他们发动起来阿山的暴动,是籍此吸引政府的多数兵力到阿山方面去,然后乘各地特别是省城空虚之际相继举行暴动,并在省城暴动时进行谋刺(盛世才)督办,企图推翻现政府,在英日帝国主义扶植下与托匪们的策动下,在新疆建立起来反苏政权,以期破坏中国抗战并达成反苏之目的(张大军,1997:209-2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日签订《同盟条约》并在中国有长期合作的传统,如果统治印度的英国和占领中国东部的日本联起手来控制了新疆,日军就可以进军中亚。英国假如不便公开支持,也必然采取面对希特勒德国在中欧侵略行动时类似的“绥靖”政策,把祸水引向苏联。这一发展态势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必须加以遏制的。

四、盛世才在新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实践

为了取得斯大林的充分信任和在未来给予各方面的支持，盛世才在《报告书》里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在新疆的工作业绩也进行了全面总结。

我是信仰马、列、斯主义的，同时我又在实践中实行了马、列、斯主义，把马列斯主义很巧妙很灵活地以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式运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是落后的新疆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在 1933 年四月革命后，我所提出来六大政策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正确理论很灵活地很巧妙地应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推动落后的中国，尤其是新疆的落后社会加快走向发展和进步的道路。……另方面作为发展新经济(经过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创造新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新政治)，发展新文化(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指针。根据我信仰马、列、斯主义的立场，我是希望着马、列、斯主义的胜利(张大军，1997：382-383)。

盛世才不仅在思想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新疆各学校里要求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斯大林传》，还热情地接待了苏联派来的外交官、军事顾问、教官和技师，“对在新疆俄人委曲求全、低声下气和百倍和气”，只是在 1938 年盛加入苏共并与斯大林建立起个人联系后，他的腰板才挺起来，甚至在 1940 年的这一案件中敢于公开指控苏联的代总领事和内务部官员。

我在七年的过程中，根据着六大政策，特别是反帝、亲苏政策，根据我对于马、列、斯主义的坚决信仰，又根据苏联友邦派到新疆的外交人员及各顾问各专家各教官各技师的热情帮助，我对于他们怀无限的感激，不仅是我以百分的诚恳对待他们，而且他们所贡献的意见只要适合于新疆的环境，有利于抗战后方的新疆，有利于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我不但采纳和认真执行，同时，我还很严厉地督促部属认真的执行。所以七年以来就在这种情势下工作着，并没有发生过丝毫的摩擦与分歧，但是我现在突然检举耶果洛夫、欧杰阳克、阿不都热合满等不正确分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违反马、列、斯主义的错误，做下了背叛列宁

斯大林党的罪行，尤其是内政部是与帝国主义及托洛茨基匪徒作斗争的机关，又是保障苏维埃社会主义安全及争取马列斯主义胜利的机关，他们既是内政部的人员，自己又做出帮助帝国主义走狗及掩护托匪的罪行，这更是罪不容恕的！”（张大军，1997：383-384）。

他们既然做出这样的错误，无疑地是违反了马、列、斯主义。我为了争取马、列、斯主义的前途胜利，我是应当这样来检举他们（张大军，1997：383）。

正是由于盛世才的坚定信仰与不懈努力，“新疆在我领导下亲苏政策已有七年来的历史，与苏联造成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张大军，1997：73）。盛世才在1935年和1937年两次分别向苏联借款500万金卢布和250万金卢布用于购买武器装备部队（陈慧生、陈超，2007：311）。据1934年担任苏联方面援助新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巴利明介绍：“从靴子到国民党徽章，我们从头到尾装备了一万人的新疆军队，苏联顾问也被委任为（新疆省的）官员而实际掌握省的管理权力。……除名称外，新疆不久就成为了苏联的殖民地。……作为最高财政机关而新设立的新疆财政委员会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顾问手中，一切议案及预算支出，没有顾问的签名就不能生效”（王柯，2014：95）。苏联派了一个现代机械化团长期驻扎在哈密¹，没有苏军的直接参与，盛世才在与马仲英和张培元的作战中是不可能取胜的。

盛世才在《报告书》中标榜自己“把马列斯主义很巧妙很灵活地以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形式运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尤其是落后的新疆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中”，但是据说，“1936年盛世才编写《六大政策教程》时，每写完一章就会马上通过总领事馆送交斯大林审查”（王柯，2014：95），所以他的“六大政策”必然带有苏联意识形态的痕迹，也必然在实践中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我们在阅读盛世才的《报告书》时，也可从案犯的供词中看到苏联驻新疆各地领事馆外交人员是如何深深地介入甚至直接指挥地方政府的工作运行。在所谓“喀什阴谋暴动案”中，喀什公安局指导员阿不都哈德尔本人是苏联国籍，他“与苏联驻喀什副领事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关系十分密切，审讯的所有材料要交给领事馆的军事顾问莫斯科格维丁”。“在逮捕犯人方面又是奉军事顾问莫斯科格维丁的命令施行的。同时莫顾问和瓦副领事又均领导并参加了审讯工作”（张大军，1997：92）。

哈生明（喀什公安局长）供称：“在（省）政府召开三全代表大会时，喀什苏联领馆副领事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军事顾问莫斯科格维丁命我赴迪化充代表，并命我向蒋司令报告要汽车”（张大军，1997：91）。一个地区公安局长出差去出席省里的会议，这个任务居然是由苏联领事和苏联军事顾问下达的，这种工作关系在中国其他地区（除了日军占领区）恐怕是找不到的。

在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其他省区，政府的旗帜统一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在新疆，盛世才打出来的却一直是有一个六角星（象征他提出的“六大政策”）的红旗。下图是当年新疆的宣传画，风格与苏联政治宣传画风十分相似，这也真称得上是民国历史中的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

¹ “该团团长为少将衔，下辖步兵680余人，骑兵700余人，摩托兵560余人，坦克兵400余人，飞行员100余人，总兵力超过3000人，配备摩托车100多辆，大小炮数百门，坦克50-60辆，飞机近百架”（陈慧生、陈超，2007：312-313）。这支苏军驻扎在连接甘肃的新疆东部门户哈密，就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所属军队进入新疆。



盛世才十年“新疆王”的六星红旗

资料来源：张大军，1997：138。

当然，在 1942 年盛世才决定反苏反共、投向蒋介石政府后，他向蒋政府提交的对自己推行“六大政策”的解释和对 1940 年的“国际阴谋暴动案”的说明，自然与《上斯大林报告书》的内容很不一样，他在 1942 年 7 月 7 日呈交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简略地提到：

“破获了新疆维吾尔族、塔塔尔、归化族、回族的大阴谋暴动案，该案之目的，是要把新疆脱离中国，成立维吾尔斯坦。该案之参加者，均系新疆各族中最有名望之人物，而该案之策动者，则系苏联前任驻迪化总领事欧杰阳克。该案破获后，所有刺客十数人，参加百数十人均经就擒，因此职（盛自称）为了测验该案北京，是否苏联政府之行为，所以去了上述的信件，以观苏联政府如何答复，他们已识破了是职（盛自称）的试探，所以迄今未得答复”（张大军，1980：4082-4083）。

盛世才花言巧语，两句话就把 1940 年与斯大林的多次电报、信件往来蒙混过去。他对自己加入苏共给蒋介石的解释是“实由学识与经验之不足，致被挂着马克思主义假招牌的人们所愚弄欺骗”，对于 1941 年建议苏联在新疆成立苏维埃政权，则是“籍以测探苏联政府对新疆是否有领土野心和是否真正执行马克思主义”，而并非“真实请求”，“是以职（盛自称）今后决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蒋则对之好言慰抚，“既往一切不但原宥，且均为负责”（黄建华，2003：68）。

后来盛世才随着蒋介石到了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防部上将高参和行政院设计委员，出版《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等书¹。1970 年 7 月 13 日在台北病逝，终年 76 岁。

结束语

¹ 盛世才在《新疆十年回忆录》中，也曾提到 1940 年的“国际阴谋暴动案”（张大军，1980：4088-4089）。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既是中国社会从专制皇权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也是全国军民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日本侵略军、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特殊时期。纵观国内学术界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对于边疆地区（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等）的关注相对较弱，但是这些地区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在今天，对于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经济繁荣都极为重要。新疆面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历史上即是内地通向中亚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今天同样居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要想认识今天的新疆，就必须了解历史上的新疆，而1933-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的12年统治，就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领域里，《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与《新疆风暴七十年》一样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汇编，我希望类似这样的民国档案材料能够逐步引起国内学者更多的重视。

参考书目：

- 包尔汉，1984，《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 陈慧生、陈超，2007，《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黄建华，2003，《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柯，2014，《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王智娟，1999，“现代国家：民族国家的组建”，潘志平主编《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3-32页。
- 薛衔天，2008，“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45-359页。
- 张大军，1980，《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
- 张大军主编，1997，《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台中：中亚出版社。
- 赵常庆等，2007，《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论 文】

民族国家构建与国家民族整合的双重变奏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¹

张 健²

摘要：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近代中国国族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观构建。近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蕴含着国族构建的一般特征，但也展示出特有的构建路径与模式，这种特定的构建道路也影响和制约着国族的基本形态。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历程，中

¹ 本文发表在《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第29-34页。

² 作者为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人员，博士。

华民族基本上完成了国族构建的历史任务，从一个传统的自在的民族，逐步转型成为具有国族意义的现代民族。但中国的国族构建仍然是初步的，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甚至是不完整之处，中国国族建设的任务仍然繁重。回顾国族构建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国族建设的顺利展开和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近代 中国 国族 构建 模式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历了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百年巨变。百余年间，中华民族辉煌顿失，黯然于世界舞台；同时中华民族又如凤凰涅槃，华丽重塑，成功实现了现代民族的自我建构，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族构建的百年大幕已然落下，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资源，却值得我们再度整理与审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你向后看得越远，那么向前看得也越远”。回顾近代国族构建的历史，我们能够更加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也能够对当代中国国族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近代国族构建的基本模式

近代中国国族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主观构建。近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的国族构建蕴含着国族构建的一般特征，但也展示出特有的构建路径与模式。正是这种历史性的探索与选择，使得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中华民族，在外部强大压力之下，仍能够在短暂的历史周期内相对完整地实现了转型，成为了世界国族构建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这种特定的构建道路也影响和制约着国族的基本形态。

1、反帝反封建双重压力下的民族主义宣传动员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虽然有内部诱因的存在，但国族构建之所以急遽而又大规模的展开，其主要的刺激性因素仍然在于作为国族对立面的“他者”的强势介入。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以王朝国家作为政治框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以一种自信的天下观念看待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的关系。但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使得中华民族尤其是首先自觉的精英阶层，开始以一种与“他者”相异，而又追求与“他者”平等的心态，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在反复比较与争论中，逐步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构建西方式的民族共同体—国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民族国家。这就需要动用民族主义这一理论资源进行宣传动员。

民族主义思潮是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产生，是民族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借用民族主义的范式对中华民族进行国族塑造，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凝聚机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国族的对外抗争并不一定是面对“他者”必然反应，这需要以内部的整体性认同为基础，而最为核心的就是要能够自觉的掌控自身命运，而不再成为一种其他意志的附属性存在。对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使命就具有了内外双重向度，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同时，还必须推翻专制统治，使国族成员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控国家政权。

近代国族构建面对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压力，这是从知识精英到普通大众，都无法回避“生

存还是灭亡”的现实拷问。因此，近代国族构建的压力是异乎寻常的，甚至是一种生存边缘的探索。而这种生存性压力也解释了，近代国族构建在进行民族主义的动员时，为何始终存在着去民族性和再民族化的内在张力，为何不同的建构主体、不同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历史的主角，而又迅速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吸纳性和包容性，法国学者德拉诺瓦曾指出：“民族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神秘，但其吸纳的能力很强。……民族现象所具有的解决或掩盖矛盾的能力，以及将形形色色的主张吸纳在一起的能力，可以说明其何以具有如此的韧性及魅力。”¹而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吸纳性和延展性表现的尤为突出，几乎与所有产生影响的意识形态均有过交集，甚至成为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宣传动员的基底和背景，而且也是不同国族构建主体与力量有效整合的框架平台。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人们对各种流派的选择往往工具意义的应急性压倒了系统理性的反思。

而且在反帝反封建的导向下，民族主义不仅统合了各种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民族主义动员过程中的内部张力。从民族主义进行国族塑造的机制看，主要存在着两种进路，一种是政治民族主义的路径，将国族认同主要建立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公共性的政治文化；另一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路径，将国族认同建立在传统性的历史文化。国族作为特殊的民族共同体，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国族认同的两种路径更多的是一种逻辑的先在性，及政治与文化的整合方式。但这两种认同方式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曾论述到：“民族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己的理论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模铸的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概念包括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²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这种内在紧张关系表现的尤为突出，从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无疑是“舶来品”，然而与之对接的文化形态的选择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而言，在极为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传统文化无法实现创造性的转换，西方文化也无法生根发芽，这也使民族主义在塑造国族的过程中，出现了认同与动员的张力。但也恰恰是反帝反封建的强大压力，使得国族文化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本位化与西方化的学术争论不得不让位于现实需要，国族文化构建最终走上了再民族化的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这种调和是以强大外部压力为前提，以最大限度的民族动员为目标的暂时性选择，并没有根本上解决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民族化问题。

2、政党—国家在国族构建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族在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政治制度性的认同，还是历史文化性的认同，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主观建构的产物。即使对于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国族的形成也不是根基性纽带的自然衍生，而是对于历史传统的选择性挖掘、发明与遗忘，是一个与现实国族构建需要不断对接与磨合的过程。从国族构建的过程和理想效果看，国族构建力图将国族塑造成具有确定性和连续性的历史与命运的共同体，以此增强国族内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甚至可以说，面对多数国族成员而言，建构本质上是一个掩盖建构的过程。

然而对于国族形成的研究，却必须首先凸显其建构性的实质，这是关系国族研究的基点性问题。也正因此，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⁴但在明确这种建构性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对这一

¹ [法]德拉诺瓦著，郑文彬、洪晖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页。

²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³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⁴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建构过程做内在动态化的分析，这就需要首先确认建构的主体。从实际的建构效果看，国家政权无疑在国族构建过程中具有核心性和主导性。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国族总是以国家为界限的人群共同体，而在国家范围内，尤其是对于超大疆域和超大族体规模的中国而言，只有国家政权凭借对权力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垄断，具备了对整个共同体进行渗透与动员的可能，其他主体的建构效应也必须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得以发挥与展示。

近代中国也是后发性现代化国家的转型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和国族构建均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性领导。而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只有政党能够担任这一角色，而且这种政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建立在西方竞争党制框架内的政见性的政党，而是意识形态强烈、组织结构严密的集权化的政党，这种政党与国家政权极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政党—国家的体制。以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体制，是揭示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视角，也是国族构建成功的核心机制。正如亨廷顿在分析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时所指出的，“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应对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与政党体系，在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独立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¹

同时政党在国族构建中的核心作用，不仅表现在强大的动员能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主义的动员起到平衡效应，对国族成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发挥了中介性的作用。在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少数民族的动员与认同是维护国族统一和凝聚国族力量的重要环节，但由于对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认识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加之国外敌对势力的蓄意煽动挑拨，使得少数民族的动员与认同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关系。而集权化政党通过其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体系聚拢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甚至可以说，党本身就是国族认同与凝聚的符号与载体，通过政党认同实现了民族认同、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集权化组织形态的政党，也都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族构建的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近代国族构建的基本完成。但这不能忽视和否定国民党政府在国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就历史进程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对国族构建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当然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斗争也从未停止，但从国族构建的角度看，这种竞争并不是以国族共同体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代价，在维护国族完整与统一的问题上，两党有着基本的共识与底线。

3、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与协调整合

在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框架内，国家与国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紧密结合体。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限度内，国族共同体才能获得内在规定性和生存保障；而民族国家的合法存在和制度优势，又必须以国族共同体的凝聚与认同为支撑。“民族国家”的制度优势和解释力度，与“国族”有着紧密的联系。²

民族国家与国族的形成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两者之间的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也决定了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既相互区别、各有侧重，但又是相互影响与制约的互动过程。从区别与侧重看，国家构建重在制度、法律和机构等客观性的内容，是一个国家对其领土主权范围内实施统一控制和管理的过程，吉登斯将其称为“内部绥靖”，“既然，固定的边界只有依赖与国家体系的反思性建构，那么，多元民族的发展就是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统治得以在

第 6 页。

¹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第 366-387 页。

² 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85-96 页。

内部进行行政扩张的基础。”¹而国族构建更强调态度、情感和认同等主观性内容，史密斯认为国族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的生长、选择以及传递；‘民族’共享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和制度在特定人群中灌输‘可信性’价值、知识和态度；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在被界定的领土上对技术、资源的选择和使用；特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力和义务的规定。”²在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两者又是相互作用和渗透。国家构建为国族构建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够开展更为强有力的一体化建构；而国族构建能够为国家构建提供合法性认同，为国家发展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撑。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也与民族国家构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既是持续性的互动过程，又是协调整合的过程。首先，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是持续性的互动过程。整个近代的国族构建是一个持续性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独立性和凝聚力都在逐步提升，不断具备国族资格的要件。虽然国家在形塑国族，但国族构建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单向度的过程，国族自觉意识的每一次提升，都会对自身及所属民族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望，这也支持着或强迫着国家对自身和国族进行建设，从而得到国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支持，巩固和维持自身的统治。也就在这种持续性的互动中，国家与国族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这种互动过程实际上也是国族构建的内部动力机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中华民族通过国家政权这一载体，实现着一种自我的建构。

其次，国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也是协调整合的过程。国家对国族构建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这种互动并不一定是一种良性的相互作用。从晚清王朝、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不同时期国家政权的国族构建都是有限度的，由于自身利益与能力的局限，国家构建往往出现与国族构建不同步的现象，从而导致国家政权丧失合法性，出现国族自觉与国家认同失衡的状态。因此，对于任何政府而言，启动民族主义的动员既是必需的，又是具有风险的，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对国族共同体具有更强的回应能力，否则极有可能出现政权自身最终覆灭于其所动员的民族主义激情中。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从国家建设和国族构建的关系看，其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政权的阶级属性和行为能力，已无法与国族发展需求相适应，最终丧失了国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支持，在政治竞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最终调和了近代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的张力，成功实现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因此，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从动态的视角看，是民族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的互动过程和协调整合过程。在民族国家的范式下，国家和国族相互推动亦相互制约，既有阶段性的成功，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最终实现了统一，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也取得总体性的成功。

二、近代国族构建的主要效应

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具有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却是从近代开始出现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被迫开启了痛苦而艰难的自我转型。应该说，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历程，中华民族基本上完成了国族构建的历史任务，已经从一个传统的自在的民族，逐步转型成为具有国族意义的现代民族。

¹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

²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中华民族基本具备国族的观念与形态

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历程，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国族的观念、形态与面貌。

首先，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与国族意识逐渐明确，国族认同感显著提升。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不断交往、融合，并由多元逐步走向一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在漫长的王朝国家体制下，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族发展，加快民族融合的措施，这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体性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近代国族构建重要的历史资源和回忆素材。但不可否认的是，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与现代国族意义的中华民族毕竟是不同类型的民族共同体。王朝时期民众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理解更多的是“天下”和“乡土”的结合，平等的国家与国族观念极为有限。这从鸦片战争时期，清王朝民众对于英国入侵者的态度中，便可见一斑。而当民族危机逐渐加深时，晚清精英们主动或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和国族的观念。而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也使得精英阶层开启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宣传动员，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向社会大众，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中传播；同时，帝国主义的入侵，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使得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个体利益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独立与自由，成为每一个个体的期望与要求。中华民族国族认同感的整体提升是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结果和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心理基础。

其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外独立，并且维持了转型中的相对完整性。现代国族形成的重要标示就是具有独立平等的地位，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因此，消除外来侵略与压迫，就成为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内容。从晚清王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同时期、不同政权都进行了一定的反帝斗争。从实现民族独立的角度看，近代国族构建的成效也是巨大的，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独立的进程，并且在维护国家统一与完整的问题上，同国内外敌对分裂势力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尤其是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同时积极利用国际有利时机，进行了改定新约运动，逐步废除和修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华民族已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消除了国外敌对势力的在华特权，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且对于疆域广阔，族体规模庞大的中华民族而言，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虽有曲折和遗憾，但基本维护了转型过程中的完整性，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捍卫。

再次，在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国族与一般性的族群共同体相比，其根本在于拥有属于自身的“政治屋顶”——国家，国族构建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国家构建与国族构建的互动、协调和整合中，实现国族对国家的认同。应该说，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对提升国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促进了国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如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以及抗日战争阶段等等。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也是存在着张力的，并不是天然的统一关系。国族自觉性和凝聚力的提升，也会对国家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国家拥有更为真切的掌控感。而在国族认同国家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王朝体制下的臣民转变成现代国家中拥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应该说，晚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获取国族认同的问题上都有所努力、有所成效，但由于自身利益的局限，都无法突破固有制度的束缚，建立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最终在国家与国族的紧张关系中覆灭。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恰看到了国族构建中的这一紧张关系，并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方式，不但提升了国族的自觉性和凝聚力，也最终实现了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最后，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的一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共同体，文化民族意义上的族体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但这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所要塑造的国族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也正因此，如何认识中华民族与其

内部各民族的关系，是近代国族构建过程中的重大议题。晚清末年，伴随民族主义的传入，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满汉关系上产生了激烈的纷争。维新派肯定了满汉蒙回藏等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派则将民主革命与种族革命结合起来，视汉族与国族等同，倡导排满兴汉。而辛亥革命后，革命派面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外危机，放弃了排满兴汉的主张，转而主张“五族共和”。但面对军阀纷争的割据局面，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重新强调民族同化的重要意义，希望以汉族同化各少数民族，形成内部同质化的国族共同体。塑造一元化、同质化的国族共同体成为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坚持的国族构建方向，虽然也宣称赋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权宜性的应对策略，对于已经具备一定民族意识的满、蒙、藏等少数民族而言，这种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无疑制造了少数民族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之间的紧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从阶级的视角观察民族问题，一度主张民族自决和联邦制。但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清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的提出和初步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赋予少数民族同胞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同时，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发展。

应该说，中华民族经过近代构建，已经基本具备了国族的形态与特征，近代国族构建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但近代国族构建并不是直线式的上升过程，其中也不乏曲折的探索。同时，国族构建又是一个持续性的，逐步累积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标志着国族构建的基本成功，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国族发展的推动性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正是不同阶段国族构建效应的累积，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成功转型。

2、中华民族仍需增强国族的认同与凝聚

近代国族构建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转型，基本上具备了国族的形态与面貌。但在构建的过程中，这种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曲折、反复和遗憾。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族构建仍然是初步的，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甚至是不完整之处，中国国族建设的任务仍然繁重。

首先，近代国族构建并未实现转型前后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在王朝国家的体制内，对待疆域往往是一种中心—边缘的认识结构，疆域的收缩与扩张同中央王朝的实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清王朝的衰落，从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诸多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当时中国的大片领土。而即使具有民族国家框架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觊觎也从未停止，不断在边疆地区制造事端。抗日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了大量被掠夺的领土和主权。但也迫于当时苏联政府的压力，1946年，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从而酿成了近代国族构建过程中的重大遗憾。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并未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香港和澳门分别处于英国和葡萄牙的控制下，香港于1997年，澳门于1999年，才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失败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仍然任重道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界并为完全划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周边国家在陆上和海上都存在一定的领土争端。国族是以明确的民族国家为界限进行统一建构和建设的，而国家统一的迟缓和国界界限的模糊对于国族整合则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

其次，国族意识存在不均衡性，国族内部的同质化程度较低。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是在封建王朝体制下，由于外部势力的强势介入而启动的。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上，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并将其与不同的社会思潮相结合，作为反帝反封建动员的理论工具。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族体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广大民众在接受国族观念，形成国族意识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别，而且还体现在地域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例如对于地处偏远，相对封闭地区的国族成员，其受外来影响就相对较小；再如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处于奴隶制，甚至是原始社会阶段。国族发展是一个内部同质化不断增强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时，国族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制约着国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进一步提升。而且，国族内部的这种差异性，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通过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动员时所产生的一定程度的社会裂痕。阶级视角能够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质，而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反帝反封建重要的力量源泉。但这种内部动员机制，也与同质性身份的国族整合产生了一定的张力。因此，在国族构建中的主客观因素共同影响了国族意识的平衡发展和国族内部的同质化程度。

再次，外部压力下的政治性认同为主导，国族文化的挖掘与塑造相对薄弱。国族作为特殊的民族共同体，本身就是政治与文化的一种结合。政治性认同和文化性认同是国族认同的两种基本途径。而在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过程中，由于内外部强大压力，国族构建主要是政党—国家主导下的政治性构建为主，通过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严密的政治组织进行宣传动员，获取了民众对特定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和国家制度的认同，从而实现了一种自我认同。但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以权力和利益相结合，并以其为中介的功利性可选择认同。对于国族构建而言，仅有这种认同是远远不够，文化仍是国族凝聚最根本的纽带，也是国族成员稳定的心理认同的重要来源。但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塑造则明显不足，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出现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倾向。对于历史悠久、族体规模庞大的中华民族而言，传统文化瞬间而彻底的否定，容易造成中华民族认同和凝聚的乏力。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国族文化相对薄弱的弊端可能不易显现，但在外部环境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国族文化在国族构建中的重要性就会逐渐显露。而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与塑造，对不同群体间的文化进行综合与提炼，从而形成同质性的国族文化，奠定国族认同的稳定心理。

近代国族构建是在强大压力下的艰难转型，分析国族构建的不足之处，并不是要否定国族构建的成功。任何道路的选择都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也都会产生响应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后现代化的国家，国族构建中的问题虽有主观性因素，但也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无奈选择。而国族构建和建设也是紧密联系的过程，国族构建中的问题或不足，也恰恰成为国族建设的重要方向和着力点。

【论 文】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¹

朱映占¹

¹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第35-43页。

摘要：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秦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沿海诸省先后沦陷，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逐渐向西北和西南转移。特别是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办公以来，西南边疆不仅从国防上，而且从大后方经济建设、内部团结等方面而言，都关涉到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然而，此时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广大少数民族，却“多数无教育之可言。彼等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对于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²特别是在有着漫长国境线的云南，“当抗战初起时，沿边一带，一闻有征调兵役之举，亦相率迁逃，此皆表现边民对国家民族认识之薄弱”。³此外，日寇在西南边疆的分裂宣传攻势也不断威胁着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如日寇侵入滇西后，四处宣传“同种同文”思想，并且开会时还在会场正中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口吻，粘贴“快来中山先生建设之大东亚阵线工作”、“抗击英美”等标语。⁴以此来迷惑和混淆滇西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甚至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日本侵略势力试图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抗战展开后，常有形迹可疑之人，向番人作反动宣传。诋毁抗战策略，破坏汉夷情感。

前年理番所属安曲查利寺有大利活佛者，曾游印度、日本，备受倭方优待。返川以后，即在各地大肆宣传，诋毁中央政府，处处为倭寇张目。行踪至为诡秘，未经官方破获。其余类此

¹ 作者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² 凌民复（纯声）：《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³ 江应樑：《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载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⁴ 张竹邦：《少数民族在滇西抗战中的作用》，载《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滇西抗战论文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事件。尚属不少。¹

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出于巩固西南边防，推动抗战建国的需要而言；还是为了正本清源，消除各种分化西南民族的言行着眼，推动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培养西南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在当时看来就显得必要且迫切了。

一、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主要由政府、社会组织或团体以及个体的知识分子所推动。在政府层面，“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协调各民族之情感，以建立国族统一之文化”。²是其目标；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层面，与政府相呼应，研究或倡导具体的国族思想和实践方法是其主要工作；在个体层面，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在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前提下，投身于国族建构的理论探讨或具体实践，为抗战建国的现实服务是其追求。也就是说，作为国族建构的推动者，无论是倡导一种思想去影响国族建构活动，还是在主流言论的影响下开展实践活动，以及提出另辟蹊径的建构方案，都是此时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影响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宗族论”。1942年8月，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的讲词中，首次提出了以宗族统合“五族”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的观点。蒋介石称：“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³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方面，他认为：“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互相关联的。”⁴在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认为：“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享受平等的权利。”⁵1943年，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更加全面地论述了“宗族论”思想，此后，这一思想被西南边疆地方政府和一些知识分子所遵循和倡导，一时间成为了国族建构的指导思想。

其二，“中华民族是一个”。何为国族？对此由于时间、地点和所关涉的群体的差异而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言，“国族即是中华民族”得到了国人的广泛共识。那么，中华民族这个国族由什么构成呢？这是建构国族时必须回答的前提问题。对此，傅斯年、顾颉刚等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且中华民族不以血统、文化为标准，“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人”，因此，“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⁶人类学家芮逸夫则从国族的四个涵义考察，认为中华国族：“领土兼具多种地形，人种混凝多种族类，语言包含多数支系，文化融合多数特质。然此种种，早已混合同化，而归于一。”⁷可见，

¹ 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松理茂懋靖汶边务鸟瞰》，成都：西南印书局，1940年，第43-44页。

²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3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内部资料，第139页。

³ 《蒙藏政策暨法令选辑》，蒙藏委员会印，内部资料，1966年，第26页。

⁴ 《蒙藏政策暨法令选辑》，蒙藏委员会印，内部资料，1966年，第26页。

⁵ 《蒙藏政策暨法令选辑》，蒙藏委员会印，内部资料，1966年，第27页。

⁶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顾潮等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73-785页。

⁷ 《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昆明）1942年第1卷第2期，载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

知识分子此时关于中华民族的言论，无论其是否看到其内部多样性，都在国族是一个整体上达成了共识，并且此时国族一体性于民族团结、共同抗日而言，其重要性显然更高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方面。因此，此时的国族建构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显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为国族建构实践中的主流话语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民族同源论”。在日寇入侵日益加剧的情形下，“民族同源论”是政、学两界倡导并努力去证实的民族观，也是“宗族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成立的前提。1939年教育部与蒙藏委员会派员赴边疆民族地区宣传抗战，其宣传要点即为：“说明我国以往光荣伟大之历史及历代各族间之关系，以种种事实证明国内各民族系同源分支，与国外民族绝不相同，申本党各族平等之真义，以增强其民族意识而固团结。”¹在贵州，张廷休则进一步从语言、神话与传说、历史、体质各个方面论述了“夷汉同源”的观点。在川南调查苗族的胡庆钧则阐述了“苗汉同源”的观点，他称：“至于苗族与汉族的关系，大致可视为同一个宗族。在体质上苗族除身材较矮，眼色较淡外，其余均与汉族近似，同属于蒙古人种。另外，芮逸夫先生由研究苗族洪水故事，推断伏羲女娲为苗族神话传说的始祖，便可证汉族与苗族自古渊源之深。”²岑家梧则通过贵州民族的研究声称：“黔省苗、仲各族，据载籍所述，秦汉以来，已与汉人杂处，其间互相通婚，发生多次混血，故今日苗、仲之体质，与汉人差异较少，而其文化，又往往保留古代中原文化之特征。……凡此均足证明苗族与中原汉人之文化，均由一母体胎育而来，其关系有如手足兄弟。”³总之，持民族同源论者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徙转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¹可见，民族同源论要强调的主要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元性和整体性，以此来说明各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其四，“天下国”说。抗战期间，有国人从中国历史以来大一统的“天下观”着眼，认为将来的中国应建立一个超“族国”，反“帝国”的“天下国”。

自然，这一个正在诞生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一旦完成，自不会成为一个像英国之国，美国之国，或德意之国之西方国家，而仍是一个“中国之国”，“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一个“三民主义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之国”，“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近人每每将中国同英、美、德、意等国家并列齐比，站在现行之国际外交关系上说这话，自然是无可非议，但如果站人类之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立场上说这话，我却认为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若是就英、美、德、意等国家的“国”字历史的政治和文化的涵义来讲，“中国之国”的“国”字早已逸出英、美、德、意等国家的“国”字范围之外了。到了最近，由于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即告完成，“中国之国”的“国”字所指的，自亦不是一个狭隘的排他的，

台北：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出版，1989年，第8页。

¹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90页。

² 胡庆钧：《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³ 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2期，第37页。

小民族的“民族国”，而仍是一个宽大的，承纳的，可以兼容并包的“天下”或“天下国”。至少的至少，在文化情调，政治意识，以及生活方式，思想形态上，仍是一个能罩着东方世界或东亚陆海的“天下”或“天下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正在诞生之中的“三民主文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之国”，不是一个狭义的中国小民族国家的新生，而是一个旧东方世界，旧“中国天下”，旧“中国天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适应历史时代的改造或重建。²

此种思想不无真知灼见，洞察到了中国历史发展延续中的独特性，但在民族国家体系流行的时代背景下，其对当时国人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不过，在以现代化来改造传统中国这一点，却仍然与不少国族建构推动者达成了共识。

质而言之，“国族（nation）是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它常常要求高度的效忠。它也是常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另一方面因为生活在国家（state）中的人，可能对此国族并不认同。”³因此，为了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增加对国族即中华民族的认同和效忠，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人为的建构。事实上，在国族建构相关理论的影响下，政界和知识界确实先后提出了诸多方法，并渐次付诸实践，来促进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步伐。

对于如何使西南各民族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并真正加入到统一的中华民族当中，成为国族一份子的问题。长期在西南边疆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认为需要满足几个前提：“1. 彻底改变过去对西南民族误解歧视的观念。2. 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化西南民族。3. 使西南民族与我们合成一整个的个体，齐向抗战的前线上走去。”⁴为此，人们提出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同化。就是拟用一种文化去同质化其他民族文化。抗战时期，关于西南边疆国族建构议题中的同化，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此种国族建构的方法，在民国初期，孙中山的相关言论中已经体现出来，到抗战时期，在蒋介石“宗族论”思想的影响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实践。其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内政部的民族政策中体现出来，而且在西南边疆地方政府的施政中也可以看到。刘文辉在推进其规划的新西康建设工作时提出，同化即是其“三化”政策之一；贵州省也先后制定了《贵州省各级新生活促进会同化苗胞计划大纲》和《贵州省各县土著民族同化工作纲要》，由政府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与此同时，在抗战期间设计的一些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开发方案，也强调了同化的重要。如任映沧在《大小凉山开发概论》中就认为：“夷区善后之最后办法为使所有黑、白夷人完全同化”。⁵在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的《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和《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中，设计人员同样认为，同化是开化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制定的开发方案中，他们声称：“边民有不

¹ 张大东：《中华民族释义》，济南：军训部西南济南干训班印，内部资料，1941年，第21页。

² 罗梦册：《中国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16页。

³ Charles Keyes（基思）的定义转引自谢剑《中华国族辨》，载谢剑《民族学论文集》上，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4年，第6页。

⁴ 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8年，第6-7页。

⁵ 任映沧：《大小凉山开发概论》，载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9页。

合理之生活，应以劝导及同化方式促其改进。”¹其二，以一种新文化同化各个民族。“故我国同化诸民族之先决问题，当先产生一种新的宗教。”²总之，“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边疆民族实行‘同化’很快成为贯穿政界和学界的主流思想和国策。”³

第二，融合。由于同化更多地强调的是用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容易滑向或被少数民族同胞理解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取消，反而不利于各民族团结局面的形成，无疑也不利于国族建构工作的向前推行。因此，有研究人员提出了突出各个民族在国族建构中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的融合方法。

而同化是带有强制性的以优代劣的意味的。须知在文化领域中，不论语言、文字、习俗、信仰等方面，本无所谓优劣之分。凡习以为常的总觉得是优，如果要以自己的所谓‘优’面强行使对方改变其‘劣’，必然会招致反抗。所以在帮助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时，强行汉化是不会得到应有效果的。相反，如果通过具体而实惠的帮助，在潜移默化中文化融合，反而容易实现。⁴

第三，近代化（或现代化）。国族建构实施过程中，不论是同化，还是融合，其实最终都要面对和解决国族和国族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无疑，欲取得独立自强，接受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是国人的不二选择。对于国族建构中，边疆社会或民族的现代化问题，基于对何为现代化的差异性认识，而存在着三类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汉族文化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因此边疆民族的近代化问题即是如何汉化的问题。显然这类观点与民族同化论趋同，受到了多数研究人员和少数民族人士的批评和抵制。第二类观点认为，欲要实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少数民族的汉化，在此基础上才容易改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实现现代化。如刘文辉就认为：“因为现代化之知识，无论属于科学方面或哲学方面，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我们要使康、傛各族接受现代之知识，进化而为现代化之聪慧人物，而不先行把这种记载现代化的知识之国语国文教他，他绝不能由愚昧进于聪慧，所以进化之前，非接受同化不可。”⁵此类观点也为部分传教士所拥有，他们声称土著族群能够从更多的汉民族“成熟文化”中受益，因此他们为非汉民族与汉人和现代性之间的接触与联系提供帮助。⁶第三类观点则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文化，既不是汉族的文化，也不是某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而是中国各民族要共同去创造的一种新文化。此类观点与民族融合论相近，但在强调民族平等的同时，还突出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问題。无疑，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其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事实上，“而所谓的‘近代化’虽是肯定生活形态方面的进步，但亦成为国族建构者用以扩大国族界线的有效利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不仅能使边区民众有合于当时代的价值观及民族意识以应付复杂的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则

¹ 江应樑：《思普沿边开发方案》，载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² 徐益棠：《雷波小凉山傛族调查》，《西南边疆》1941年第13期，第18页。

³ 徐振燕：《任乃强和他的〈西康图经〉方志的“经世”情怀》，载庄孔韶《人类学研究》第3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⁴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自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5页。

⁵ 赵心愚等：《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下，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730页。

⁶ [智利]罗安国（Andres Rodriguez）：《民国时期的民族构建和人类学：四川西部的传教人类学事业（1922-1945）》，蔡晓军译，载特木勒《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5-133页。

使边区文化与主流文化达成一致，共同迈入‘近代化’之历程，形塑出国族的一体性，成为‘大中华民族’。”¹

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为了使同化、融合或近代化的目的能够实现，又采取了诸多具体实践形式和内容，要而言之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通过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种类、族源及分布等问题，来确认西南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各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西南的地位益形重要。西南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问题，更为各方面所重视。而要解决西南民族以上各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²

因此，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团体相继成立，在整合各种研究力量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调查和研究，搜集西南少数民族的相关资料，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是为国族建构在西南边疆的推行提供依据和参考。无论是西南民族的分类的研究，还是族源及分布的研究，目的都是要表明西南少数民族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从空间的分布而言，无疑都是国族的一分子。

第二，通过教育和训练培养国家观念和国族意识。

在此长期抗战中，国家须尽量发挥其国力，对千万的西南民族，应从速施以训练，加紧民族团结，统一民族意志，增强民族抗战力量。³

显然，在有识之士看来，要发挥西南少数民族作为国防民族的重要作用：“非先从教育入手不可，首先灌输其国家观念，培养其民族意识，而后施以军事上之训练，则上述困难，自能迎刃而解也。”⁴而且，在发展边疆教育的过程中，统一西南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族建构的推动者看来：“语言文字不统一，其害有三：一为妨碍国家民族的团结，再为造成边疆住民之感情隔阂，三为阻碍政令之推行。是故边地特有语文，理应使之消灭，而纳整个人民于国语国文系统下。”⁵因此，国族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统一，即实现国语国文的普及。

第三，通过政权建设强化国家观念。国族建构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西南边疆继续推进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实现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设置。在基层设置乡镇，推行保甲制度。当然，由于考虑到“边地人民服从土司已成习惯，而近年以来各土司因教育文化之熏陶，知识增进，对于国家思想、政治意识均能了解，咸知服从中枢，拥护政府。偶遇外力之侵袭，尚能率领民众设法抵御，倾心向内，克尽守土之责。在此国防设备薄弱时期，土司既为一般边民所信服，尚须赖其号召团结共御外侮，似难遽为废除”。⁶因此，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特别是云南实施了“缓进”的改土

¹ 谢幸芸：《近代中国苗族之国族化（1911-1949）》，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81页。

² 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青年中国》1940年7月，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³ 凌民复（纯声）：《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⁴ 黄国璋：《西康在我国国防上之地位》，《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第42页。

⁵ 江应樑：《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载林文勋《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30页。

⁶ 《云南行政纪实》第二编，《边务一土司制度》，1943年，第1页，转引自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归流政策，即采取“设流不改土”的办法。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川边地区建立了西康省，随着省籍意识的出现和增强，身处西康的各个民族，其国家意识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强。

由于中央权力核心地位的下降和地方势力的兴起等诸多原因，以省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地域性势力为支撑，以省区文化的认同和地方特殊性为基础的省籍意识逐渐兴起，在多元认同结构中成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选择途径之一。¹

第四，通过国家象征符号的宣传来引导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如在1937年，蒋介石发起组织了京滇公路周览团，4月该团从南京出发时，“携带含有蒋介石的救国主张和大量生活照片、中央的建设图表和有关民族复兴的内容的有声影片和其他宣传材料等，到沿途乡村放映和散发，宣示中央的德意和挽救国难的决心。”²在此基础上，力图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有一个感性而具体的认识，进而明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1943年，新生活运动总会在云南设置的两个边胞服务站，在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同时，“附带宣传抗建，并作搜集、调查等工作”。³其中悬挂蒋介石肖像也是其宣传抗战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五，通过风俗改良来同化或现代化西南少数。其中包括西南少数民族主动做出改变，来求得现代化的举措。如1937年，在外求学归来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在凉山彝区改良祭祀风俗，改良房屋建筑等，推动彝区的近代化进程。云南滇西的傣族土司也认为，风俗改良是少数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而倡导风俗改良活动。还包括政府采取强制手段，以期达到同化西南少数民族的目的。如“民国28年（1939年），贵州安龙县长王佐提出要将少数民族的‘一切风俗习惯极力改良，与汉族同化’，权绅袁廷泰在龙广要求绅土地主强迫少数民族‘讲汉语着汉装。’³³年（1944年），省主席杨森训令各级官吏迅速果断铲除民族特点，不让一个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服装，扬言要以‘清剿’代替‘羁縻’，以‘同化’辅助‘清剿’”。⁴总之，这些风俗改革或改良活动其最终目的即是，使得西南各民族“皆应确认中华民国领土之内，只有一个国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厉行尚同运动，务使全国任何宗支族，逐渐趋于一种信仰，一种文字，一种语言，一种习俗”。⁵

第六，倡导移民垦殖和民族间的通婚来融合各民族。抗战时期，在国人看来，移民西南边疆从事垦殖不仅是解决战时的人力和物力问题的重要途径，事关抗战之胜负；而且能够改变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和构成，有利于国族建构工作的实施。因此，在政府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垦殖计划和实施方案，在知识界也就移民西南边疆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就注意到移民垦殖对国族建构的意义。如在西康考察的人员就建议“以移民与本地妇女结婚为主。虽然康女极愿嫁与汉族男子，但结婚后，男子及其后代容易被同化，而收不到实边的效果。因此，在移民垦殖之前，应对移殖人员进行相当的教育”。⁶在移民垦殖的同时，鼓励民族间的通婚，以此希望实现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

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

¹ 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² 潘先林，张黎波：《连通中央与边陲：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团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

³ 周简文：《新运总会边胞服务站工作情况一般》，《边疆通讯》1943年第3期，第8页。

⁴ 贵州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安龙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3页。

⁵ 李寰：《中国边政机构之回顾与前瞻》，《边铎月刊》1946年2、3期合刊，第8页。

⁶ 川康科学考察团：《西康边防问题及解决途径》，内部资料，第24页。

起来；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¹

第七，鼓励和依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带动本民族的人民，积极投身中华民族的共同抗日的事业中来，以此增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一体意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负责滇西抗战的11集团军和云贵监察使署，不仅连发《告土司民众书》，对滇西各土司和境内百姓进行晓谕和安抚；而且还派专员尹明德赴腾冲、南甸、干崖、盏达各土司地抚慰，他每到一个地方，除赠发“为国干城”匾额外，还转发蒋介石给各土司的电文及蒋的照片，以及给当地有名望地位的人物的军职委任令。希望借此使边民内向，土司归诚，协助抗战。²蒋介石给滇西各土司的电文称：“本委员长翘首南天，良深廕念……深盼各司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副余厚望。”³

二、西南边疆各民族对国族建构的反应

第一，支持或参与抗战，表达爱国热情。以龙云、卢汉为核心的云南彝族统治集团深受蒋介石“宗族论”思想的影响，主动对汉族和汉文化产生好感和认同，在此基础确认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在国家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他们不仅能够组织军队出滇抗日，而且还号召全省各族人民抢修滇缅公路、支持和投身滇西抗战。在滇西抗战期间，南甸傣族土司龚绶曾致电蒋介石声称：“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⁴云南丽江的妇女，自抗战军兴以来，不仅支持当地壮丁应征入伍，承担起维持家庭的各项责任，而且送新兵出征、募捐等工作也多由她们操办。对此，时人感叹：“她们的民族意识是虽然不像都市妇女一样的清楚，而其实际上担当救国的工作，有过之无不及的。”⁵正是在此种与国家共存亡观念的影响下，“在抗战中，从泸水土司、头人到各族群众没有一人投降日本，没有一人当日寇顺民，没有一人叛变投敌，全民族一致抗日，忠心报国，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援和保证了怒江抗日守防和反攻的胜利，最后终于将日寇全部歼灭和赶出了国门”。⁶1939年5月，川西北松潘关外24个部落，30万藏族人民组织请缨杀敌代表团并发表宣言，在声称自己为黄帝子孙的同时，表达了为国家独立、民族生存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在抗战物资运输、军用机场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⁷

第二，接受学校教育，参与到国族建构的实践活动中来。

教育是国家建构抽象的身份认同的最厉害的权力机器。同时，知识的获取有助于人民去

¹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顾潮等编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5页。

² 张竹邦：《少数民族在滇西抗战中的作用》，载《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滇西抗战论文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³ 张竹邦：《少数民族在滇西抗战中的作用》，载《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滇西抗战论文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⁴ 张竹邦：《少数民族在滇西抗战中的作用》，载《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滇西抗战论文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⁵ 银涛：《丽江妇女的生活概况》，《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第175页。

⁶ 李道生：《峡谷深处的土司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⁷ 周勇：《西南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235-236页。

建构有关自己的合法 (authorised) 历史版本 , 并以此族群身份取得社会的合法地位。 ¹

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了。例如在贵州石门坎及周边苗、彝聚居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经常宣讲抗日救国之道,并积极排练抗日歌曲,如《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部分译成苗文在苗族村寨歌唱。抗战胜利后,石门坎更召开了千多人的庆祝大会。”²在贵州苗族地区旅行的人士看到:“在省立都匀中学中,尚有苗生数十人,他们都是着汉衣,习汉文,在同化苗民上,这些受教育的苗民青年,当然是有大大力量。”³

第三,少数民族上层或有识之士深化了国家(国族)对本民族而言的重要性的认识。国难当头,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呼吁彝族同胞:“此后宜对政府一切设施,加以深刻认识,进而服从所颁法令,执行一切规定,使对内对外,均有一系统可循,增进自身之利益,融洽民族间之感情,一图消灭过去之不良现象,而体念国家艰难,一致巩固后方治安,实最应有之表现。”“希望夷胞一致把握时机,一致努力奋斗,抱国亡我亡,国存我存之决心,参加抗战建国,求光明前途,增民族地位,夷胞曷归乎来。”⁴苗族人士梁聚五针对抗战时期的国族建构舆论与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消极方面要消除各民族间的“轻视”和“仇视”成见,废除对各民族含有侮辱性的称谓;在积极方面,“要提高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复奖励相互通婚,戳开‘种族’间的障壁,并构成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讲的‘国族’新阵线,以争取民族抗倭战争的胜利,完成国民革命。如此,才能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真幸福。因为这幸福,是国内各民族血的总汇的代价”。⁵

第四,组织边胞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表达同为一体的情感。1938年4月和1941年2月,包括云南、西康、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在内的多个民族代表,先后两次组织“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向国家领导人献旗致敬,并赴抗战前线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献旗祝词》和《告前方将士书》中声称:“代表团之组织更有重大意义,即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之分化吾国民族政策,使彼知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相依为命,为一不可分离之整体。日寇之种种挑拨离间政策,及反三民主义宣传,皆为徒劳无功。”⁶此外,1938年6月,西康的康南民众推派代表组织“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前线慰劳将士,并且捐献金银饰物资助抗战;而且,还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奔赴西康各地宣传共同抗日。

第五,反对同化,争取平等相待。如1939年夏,国民党教育部一个视察团到威宁的石门坎视察,斥令不准使用苗文,当地苗民据理力争,表明不能接受。⁷对于民族同化的思想来源之一“民族同源论”,苗族人鲁格夫尔持反对意见,而且他认为民族平等问题比民族源流问题更重要,他称:“近来有人大倡苗夷汉同源论,我是苗夷之一,我对此问题不赞同,也不反对。不过据我观察所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各族共赴国难,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绝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同源不同源,苗夷不管,只要政府

¹ 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² 张慧真:《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76-77页。

³ 薛子中:《匹马苍山:黔滇川旅行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⁴ 岭光电:《俚情述论》,成都:成都开明书店,1943年,第71-72页。

⁵ 张兆和,李廷贵:《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上册,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内部资料,2010年,第415页。

⁶ 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第89页。

⁷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04页。

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¹

三、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意义

于国内而言，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国族建构实践和展开的国族理论的探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了解，增强了一体感。随着国族建构重要手段之一的边疆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西南少数民族的封闭状态逐步在改变，其文化也随着与外界的接触、交流的增多，而发生变化。如“羌族正在被汉族所融合。有通过文化和商贸接触产生的接触。也有异族通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羌族地区的村寨修建了一些汉式学校，这些学校传授的是汉语和汉族的文化。在威州的一所正规学校，已得到了汉族和羌族学生的认可。”²

第二，促进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随着国族建构活动的不断实践，受其影响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有所增强。1944年，《中国回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二届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即称：“人数达数千万，分布于二十余省的回民，应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华国民’，而不是自外于中华民族的种族。”³针对日军占领泰国后，发表了离间中国傣族的言论：“泰国是泰龙（大傣），是世界傣族的主体，西双版纳是傣因（小傣），是主体的分支，分支应该归入主体，小傣应该与大傣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傣族主义国家。”西双版纳傣族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严正声明称：“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中国人，西双版纳的土地是中国人的土地，外国人不能侵占。”⁴显然，傣族人民也强化了中国人意识。苗族大学生杨汉先等人受当时全国呼吁团结抗日的气氛影响，拟写了一份《告石川联区同胞书》称：“苗族是中华的一个民族，多年来都被歧视，现在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全国各族民众都必须团结抗日之际，我们苗族更要奋力前进，以求达到自决自治之目的。”⁵

第三，深化了政府和学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为了有效推动国族建构的各项工作，政学两界在西南地区开展了诸多针对少数民族的调查活动，加之在国族建构过程中，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及“民族同源论”的一系列争论，深化了政府和学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使人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或“多个”这样大而化之的词语来描述西南民族，也不能武断地把诸多西南少数民族仅仅看成是汉族的宗支。正如芮逸夫所言：“事实显然，在整个中华民族内，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不可分的整体，但由学术的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⁶显然，随着国族建构活动的深入，对于西南少数的族称、族源及分类等问题，国人有了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除了对国内产生影响之外，于国际而言，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推行的国族建构活动，也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回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的言论。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分化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目的，发表了不少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言论。四川彝族土司岭光电就意识到：“倭寇前数年出版刊物中，曾载西南傣族系南洋马来起来之民族，以其习尚语言，与我和族相近等等。又载泰国人民的一切，我和人无不关怀，不仅泰国内人民，即移殖旁国之泰民，亦当力予保障，以系兄

¹ 《鲁格夫来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5月15日，第21期。

² 李绍明，周蜀蓉：《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21-122页。

³ 马建钊等：《中国南方回族社会团体资料选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⁴ 朱万一等：《中国少数民族斗争史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85年，第55-58页，转引自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1-272页。

⁵ 龙基成：《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⁶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昆明）1942年第1卷第2期，载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册，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出版，1989年，第3页。

弟之邦也。同时近年泰国朝野，一致排斥华侨，及尽力怂恿其近邻人民，任意向我无智识边民宣传，使接近泰国，或与地方官吏为难，在近日寇侵入，即倡言西南为支那之宝藏地，亦反抗之根据地，得之则有丰富之矿产，可供开采。广大劳力可用等。由上各语观之，可谓倭寇已施其威迫利诱之能事。”¹针对此类言论，推动国族建构，强化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成为当时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而在此过程，他们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不仅阐明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事实，而且还证明了各个民族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在此影响下，西南各种民族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抗战，以实际行动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化各民族团结的企图。

其次，反驳了“大泰民族主义”。针对“大泰民族主义”持有的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的观点，1938年凌纯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上发表《唐代云南的乌蛮和白蛮考》，从历史文献记载、文化特征，以及语言学材料等方面详加考证后得出结论认为：“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及广义的藏缅族”、“两爨乃古代的楚人移入滇中，而同化于罗罗者”、“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等，对“泛泰民族主义”的历史依据进行了消解。针对暹罗1938年改国号为泰国以来，“企图组织泰族国家，把中国的摆夷仲家等泰语族包括在内，并宣言将收复历史上泰族已失去的故土”的分裂我国民族团结的言论，1944年岑家梧在方国瑜、陈序经、凌纯声等驳斥的基础上，发表《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一文，称：“作者此刻仅就仲家自身来源传说上观察，仲家与汉人在血统上的关系，已有极悠久的历史”，²对“大泰民族主义”的族属涵盖范围进行了缩减和消解。

再则，进一步证伪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些关于中华民族成员西来说的观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西来说甚嚣尘上，不仅汉族西来说广泛流传，而且一些少数民族的来源也被认为与西方世界有关。如1915年以来，受在川西羌族地区传教的托伦士（Rev. Thomas Torrance）的影响，在羌族中产生了羌族是犹太人后裔的言论。在黔西北、滇东北的传教士看到彝族诺苏人与汉族和苗族的在文化、体质方面的差异，而推测诺苏人或许源于讲印欧语族的部落。在滇缅交界的拉祜族聚居区，传教士在当地也宣称，“洋人与裸黑（即拉祜族）原是一家，洋人为舅父之子，裸黑为姑妈之子，同居西方，后裸黑始迁来东方，与汉人本无关系，辟土耕种，亦非中国之地”。³对此，国族建构过程中，在秉承“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信念下，研究人员从考古资料，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给予了否认，并逐步确立了中华民族本土起源和发展的主流学说。

四、结论

国族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牵涉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归纳而言，抗战时期之所以在西南边疆推行国族建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考虑，还有对西南少数民族与国家整合的长远规划的设想。

首先，是近代以来边疆危机日益加重，国人重新认识边疆，推动边疆建设，探索边疆民族政策的继续与发展。即“我国自鸦片战争以还，国步艰难，日甚一日，九十余年所丧失之土地主权，已令人痛心疾首，而近年以来更有甚焉；四省沦亡，冀察危殆，华北风云变幻未已。此何时乎？非非常时期耶！我国疆域虽大，能禁蚕食几时！故稍知国是者，咸觉国族灭亡之祸，迫于眉睫矣”。⁴因此，近代以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人的不懈追求，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种追求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¹ 岭光电：《保情述论》，成都：成都开明书店，1943年，第68-69页。

² 岑家梧：《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第21页。

³ 林超民：《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5页。

⁴ 方秋苇：《非常时期之边务》，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总序》第1页。

其次，是抗战军兴以来，实施文化国防，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形成的分化中华民族言行的现实需要。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边疆，不仅与多个国家接壤，而且民族众多，且有不少跨国境而居的民族，易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挑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对东南亚国家的侵占，使得西南边疆也成了抗战的前线。因此，在此开展国族建构工作，一方面，希望通过建立起统一的国族文化，让西南边疆各民族成为守土有责，爱国爱乡的国民，从而在西南边疆构筑一道抗日救国的坚固长城；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依据来说明：“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分子，合则两利，离则俱伤。”¹据此来抵御和消解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及文化两个方面的侵略与分化。

最后，是对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国家整合的尝试和规划。

为百世之计，求我全国族之永久团结，似宜积极设计导此边胞社会，使其生活设备文物制度和我国其他区域一样的趋于现代化，以其地势之利，人事之优，好好建设则退足以固国防，进足以拓疆土。²

也就是说，国族建构的目的是探讨统一于近代化或现代化之下的国族文化的努力，即战后边政研究人员继续讨论的边疆文化国族化的方案。

讲到国族化边疆文化，很容易使人误解，这是大汉族文化同化主义，是消灭边疆文化而代以中原文化的意义。因此，我们讲国族化边疆文化，有三点须加以申明，以便国人尤其是边胞的认识。第一是今日的国族文化，不是中原民族独创的文化，而是国内各民族文化混融的结晶，现在却正在积极地现代化。第二国族化不是汉化，是国族底现代化，旨在发扬边疆固有的优良文化，提高边疆文化生活水准，以加速国族文化现代化。第三是文化国族化，不是地方或民族便没有自决自治的权利。¹

然而，由于在指导思想和实践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对中华民族具体内涵的认识上还不够深入，行动上缺乏具体而具有说服力的目标指向，使得抗战时期推行的国族建构实践并没有解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问题；并且随着抗战的结束，对西南少数民族各种问题的研究及边疆民族问题的紧迫性让位于政治斗争，抗战时期形成的民族与国家整合的探索与实践没有得以很好的延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种局面才又有改观。不过，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族建构的思想和实践，仍然为我们此后处理多个民族与单个国家的关系和整合等问题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尚需要我们进步一去总结和探讨，无疑这将有利于我们当下民族与国家相关问题的解决。

¹ 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第98页。

² 陶云逵：《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9、10期合刊，第16页。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张承焘：《中国边疆问题》初集，边政公论社，1949年，第21页。